

左宗棠因地制宜的经济思想

舒求

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ej.v8i8.2796

[摘要] 已有研究对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的特点及经济思想未进行深入阐发。基于此,本文深入阐述左宗棠经营西北的农牧并举、务本强国、抵御外侮等思想和实践活动,分享总结其经济思想中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理事逻辑,为当前西北开发和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 因地制宜; 西北; 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9 **文献标识码:** A

Zuo Zongtang's tailored economic ideas

Qiu Shu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thoroughly elucid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ideas of Zuo Zongtang's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in Northwest China.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Zuo Zongtang's idea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managing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Northwest China, focusing on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and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It shares and summarizes the director's logic of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ing precise policies in his economic idea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northwest; economic thought

引言

左宗棠的重农思想从重视农耕发展为农牧并举,体现出他经济思想中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思考对策的理事逻辑,这一点具有较为典型的源自理学思想的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逻辑。在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中,这种经世致用的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也为其顺利地复兴东南、西北各地经济提供了思想基础。

1 农牧并举

西北地区深居内陆,地势高亢,气候干燥,缺乏雨水,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极大的阻碍了屯田垦荒的进程和西北农业的发展,左宗棠从民生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兴利之道,尤重民生,尤宜因地制宜时从相劝课”^[1];并依据西北高寒及地理条件,扬长避短以尽地利,“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所称开垦一节,姑从缓议。”^[2]左宗棠不盲目推行汉地的农耕方式,先因其利而利之,“新疆户民本务以畜牧为重,耕稼次之;亦由土旷人稀,耕者用力勤而所获少,牧者需人少而所获多也。经理之始,即当为异日设想,择其水泉饶沃者为田畴,择其水草丰衍者为牧地,庶将来可耕可牧,丁户滋生日蕃,亦不患无可安插,正

不必概行耕垦,始尽地利也。”^[3]根据新疆户民惯于畜牧的特点因势利导,将水草丰衍的区域划为牧地,以供户民放牧;但另一方面,在水泉饶沃的区域实行屯田,此举不仅可以以农安民,又可在土地不给时,以农养民。此外,左宗棠汲取之前西北治理的教训,“塞外除安西、哈密、巴里坤寒苦沙碛物产荒俭外,余皆沃野,耕牧攸宜。惜自乾隆间平新疆后,百余年来悉以捐之肉食纨绔,不一检校,遂至耗中事西,反以为累矣。”一一检校民户,清查人口成本,“择水草便宜处所,查明户口,酌量成本数目”,根据成本数目,且在兵民艰苦的地区,“于养廉内提银二千两,以一千两饷发安西协购买种羊,散发兵丁领收;以一千两饷发该州买羊,分发贫民畜牧。”“以收畜牧之利,俾户口渐增,一面广种多收,渐谋生聚。”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拨出两千两,一半分发安西兵丁购买羊种,一半给安西贫民买羊畜牧,且分发羊种“所领成本分作三年摊还,不取息耗”,只求利民,这样不仅给民实惠让民户心存感恩,且通过清查也牢牢掌握了当地户民情况,同时“散给种羊及分给转运疲乏马牛驴,得以助其耕垦”,农牧相长,使西北地区在广种多收、渐谋生聚的基础上实现“地方既裕,民物蕃盛”的目的,又可以畜牧之利、渐增之户口为税源役源,实现当然政府自给自足,不需“耗中事西”的目的,可谓一举多得。

左宗棠这一系列的经济布局,既尊重了户民的原有生产习

惯,得到户民拥护,广收人心,又计谋长远,导民以利,让户民按照政府的安排规划经济,从经济出发,从生产到生活掌控户民,最终达到安定西北目的,可见左宗棠的经济观念时常以政治为导向,为此长远思虑。

2 治水养民

河西地区降水量少且集中,集中在每年的6-9月有降水,与农作物降水需求量与时间极不匹配,且蒸发量高,地表水不易保存。然而西北地区境内的三大流域水量、祁连山高峰的冰川积雪融水以及地下水却相对丰富,利用得当对当地农牧业发展十分有利。

左宗棠认为水利虽为“百世之利源”,但行之也需谨慎,他将西北水利与东南水利作对比,认为水利建设要与当地条件匹配,不能“西北皆水田,东南皆陆海”,要与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得其宜,要在“以其时,行其野,历其乡,询其利,访其宜”的基础上做到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才能真正兴利于民。

左宗棠主政西北后,面临“甘省久遭兵燹,遗黎仅存”的困境,他积极谋求恢复当地生产,“督部堂安插、发赈”,并循上古治生之法,导水利以便民,“上古圣王躬耕为治,两汉循吏莫不讲求水利者,诚以衣食为人生所急需,必有以开利赖之源,而后民可得而治也”。^[4]左宗棠从水利出发,治水养民、养而后教的思想,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也已论及。^[5]其后,左宗棠又从兴屯田、依地利、治百姓三个角度践行他的水利观,使西北之水真正成为养民之源。

一是兴屯田,生业养民。左宗棠重视屯务,也很早意识到屯务与水利的紧密关系,“水利为屯政要务”“开屯之要,首在水利”。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经理陕西民变,就已将水利与堡寨屯田卫民结合起来,以休息养民,“陕西省兵燹之余,民困日甚,堡寨所以卫民,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论者每谓大乱初平,宜先休息。不知欲求休息,必先图所以休息之方。堡寨成则寇贼之患纾,水利修则饥寒之患免,劳于前者必逸于后也。”^[6]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经理新疆,也同样如此,命张曜率军在哈密兴屯垦荒,“张曜躬率所部,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张曜兴屯颇有成效,得地19000余亩,不仅足够军需,且大利民政,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西北治地荒,尤资水利。就洼潴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左宗棠以张曜经验为训,“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7]张曜水利屯田出发点在济军,却广济民利,保绥戎藩,安民百年。左宗棠重张曜经验也正在此,水利兴修之所以被称为百年基业,就在于养民安民,“夫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不仅陕西,甘肃、新疆等广大西北地区亦是如此,左宗棠将水利与屯田相结合,“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执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赈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

行旅。”^[8]“现之屯军哈密,修水利,兴屯田,一为鸠集哈回,以固藩卫;一为置子中央,杜贼勾结;而取刍粮、节挽输,犹其小者。此为言抚者策也……如天之福,此后哈密屯务可兴,敦、玉耕垦渐广,庶粮、运两事尚或不至束手。臣惟尽其心力所能到者图之。”^[9]以水济农、以农保民,终使西北“诸废渐举,均欣欣然而生气”。

二是依地利,尽水利之利。依地利兴水利本是助农之本,左宗棠在西北治水亦是如此,滨河开流、临泉凿井,且在没有得到清政府有力的资金支持下,采取防营独办、兵民合力、官贷民力等多种方式,兵农相资,贫富相宜,“甘省各州县,除滨河及高原各地方,向有河流、泉水,足资灌溉外,惟现办赈之庆阳、宁州、正宁等处,川地较多,尤宜凿井,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民当乐从,况现正当农隙之时,地方尚尤饥馑之苦,赶速图之,当较陕西尤易集事也。”并根据当地条件,在甘肃将开井和区种相结合,“开井与区种,两法本是一事。非凿井无从得水,非区种何能省水。两事并举,方能有益。”在引水入田,节水省水的基础上,小块耕种,以便抗干旱、保地力。在新疆,分别干支,与坎儿井相结合,“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梳棉,专赖渠水,渠水之来源,惟恃积雪所化泉流而已。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治西北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惟修浚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源流并治,并配以“以耕垦、种树、沟洫为课程”,在保持水土的基础上,将水利之利发挥到最大。

三是依水而治,利用水利控制户民。左宗棠言:“治西北者,宜先修水利”虽有利民生之意,但也含控制之见。水利利大,民间势力大都想染指其间。官府借处理水利纠纷,抑制豪强,并管控民户,“甘肃西路凉州、甘州、肃州向无河流沟洫,全恃山泉雪水,年以资灌溉,岁计之丰歉,物产之盈细,专恃乎此。故度地居民,即以蓄水之坝为经界。平番县境庄浪城外,水分四坝,民间各遵章引水灌田,公定时刻,层递分注,渠长互相稽察,以解纷息斗为务,亢旱则绅耆亦从而襄事焉。”以定民间引水章程,使民户田地有界、灌溉有时。左宗棠在新疆善后处理上,也同样仿甘肃治法,“窃维新疆善后事宜,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以修浚言之:哈密修石城子渠;镇西厅修大泉东渠;迪化州修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绥来县修长渠;奇台县修各渠;吐鲁番所属渠工之外,更开凿坎井一百八十五处;库尔勒修复旧渠四十里;库车浚筑阿柯寺两大渠。皆各防营将领督饬防营兵勇轮替工作。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值。地方官募民兴修者,亦议给工食。诚以民困甫苏,未可责以力役也。”“以清丈言之:量地,即履亩之法。长短广狭,非丈量不能明;肥腴瘠薄,非按测不能准。而西北地多高仰,土性善渗,需水尤殷。水足者地价倍昂,以产粮多也;水歉少收,价亦随减。将欲则壤成赋,必先计水分之充曲,定地亩之瘠饶,科粮赋之轻重。光绪四年,征收无额,臣与刘锦棠、张曜、周崇傅函牍相商,仿古中制而更减之,按民间

收粮实数,十一分而取其一。经收回目任意增减者,许户民自陈,印委各员传经手人斥责,甚者加以革黜。并令于收获后通行清丈,按地亩肥瘠、水分赢绌分九等科赋。地既广阔,创行之初事体繁杂,人役弓手多不谙熟,一时未能集事。旋改为上、中、下三等征收,以取简易。迨五年秋成,册报犹未造齐,仍照上年十一分取一之例征收,民间输将争先。约计六年秋获,丈量可竣,按亩科赋,多寡始归一律矣。”借由修水利,定民利,清丈土地的同时,按水多少给定税额,从税到人,系统管理。

不仅在西北,左宗棠在江南地区亦是如此。左宗棠认为“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奸愿之萌,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为开源节流、为民兴利,他大力整顿两淮漕运、兴修水利,“疏陈善后事宜,筹闽饷,浚湖汉,筑海塘,捕枪匪,又核减漕粮、酌裁关税,商农相率来归。增书院膏火,建经生讲舍,设义学,兴善堂,百废俱兴。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连对左宗棠一直不满的赵烈文也钦服:“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省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李鸿章)十倍。”左宗棠在江南地区以水利兴修为基础的兴农之举,使得江南地区经济得以较快恢复,也成了江南地区商贸发展、文化复兴的百事之源。

3 结论

无论是治理西北的农牧并举,还是治水养民,都体现了其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精准施策的经济思想。这既与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逻辑一脉相承,也为其他地

区和后世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即使是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走并已经走出中国道路,各个地方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推进现代化建设。

[课题来源]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号2023J0689)”。

[参考文献]

- [1]中国史学会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2]社经国.《左宗棠与新疆》[D].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 [3]秦翰才.《左宗棠全传》[D].北京:中华书局,2016.
- [4](清)左宗棠著,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D].长沙:岳麓书社,2009.
- [5]彭大成.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30(1):46-57.
- [6](清)罗正钧著,朱悦.朱子南校点:《左宗棠年谱》[D].长沙:岳麓书社,1982.
- [7]马啸.左宗棠与西北近代生态环境的治理[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72-78.
- [8]付宏渊,李伟.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思想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8(5):80-84.
- [9]孙良珠.《左宗棠全传》[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舒求(1981—),男,土家族,湖南溆浦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转型。